

考古篇

记者 李振文 王敏

追寻时光步履

1971年：初步调查与确认

20世纪30年代，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驾驶飞机飞越宁夏贺兰山时，被山脚下一片排列有序的圆锥形“土堆”所吸引。这一刻，他按下了快门，从高空记录下这些奇特的地面景观。“那张照片里的‘土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其中一座西夏陵。”西夏陵区管理处副研究员杨弋介绍道，“但在当时，人们对这些建筑的性质一无所知，它们只是贺兰山下默默无闻的土丘。”

1971年底，宁夏文物工作者对贺兰山下一处被称为“吴王坟”的古墓群进行初步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些刻有神秘文字的残碑。这些文字形态方正却难以辨识，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兴趣。

“当时发现的残碑上刻的是西夏文，当时这是无人精通的。”杨弋说，“考古专家钟侃先生他们一头扎进浩瀚史料中寻找线索，最终在明代《嘉靖宁夏新志》中找到了关键记载：‘贺兰之东，数家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这段文字为确认‘土堆’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碑文与文献的相互印证，考古工作者确认这处规模庞大的古墓群就是西夏的皇家陵园——西夏陵。

1972-1978年：系统调查与突破

1972年，正式对西夏陵遗址区域展开系统考古调查。首先，通过考古调查确认了西夏帝陵的位置，随后依次发掘了1座帝陵（即6号陵）、3座碑亭、1座献殿以及3座陪葬墓。1972年至1975年，为了解西夏陵的墓室结构，宁夏博物馆对6号陵（原编号为8号陵）进行了深入的考古发掘工作。

1975年，宁夏博物馆对7号陵东、西碑亭进行了考古发掘。1977年，为了进一步摸清西夏帝陵与不同规模陪葬墓的关系，宁夏博物馆对MIII-107号陪葬墓（原编号M101）进行了考古发掘。

1978年，钻研西夏文字的学者李范文带来突破性进展。他蹲守西夏陵数载，逐一考释3270块西夏残碑，最终从七号陵碑亭发现的残碑中拼合出一块碑额，确认上面的西夏文字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这一发现使七号陵被确定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成为迄今9座帝陵中唯一确定主人的陵墓。

1986-1991年：帝陵的最终确认

“西夏陵遗址规模宏大，现在我们知道，它共有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1处北端建筑和32处防洪工程等四种类型的建筑遗址。”杨弋指着西夏陵博物馆中的沙盘模型介绍道。在这一阶段，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陵区开展了全面的重新调查，进行了统一编号，并完成了详细的测绘工作。同时，先后开展了北端建筑遗址和3号陵东碑亭的考古发掘工作。

1986年至198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陵区东北侧的北端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建筑构件、瓷器、陶器、泥塑、石刻及铜铁器等编号文物近300件。198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3号陵东碑亭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大量建筑材料、石刻、铜器等文物。1987、1990、199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宁夏地调所连续三次对陵区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与测绘工作。绘制了陵区总平面图、分区平面图以及50余幅帝陵和典型陪葬墓平剖面图。通过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最终确认了9座帝陵，陪葬墓的数量也由近百座增加到206座。

1998-2008年：布局研究与考古发掘

在这一阶段，为了配合文物保护单位，先后对3号陵、6号陵地面遗迹进行了清理，同时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

1998年至1999年，考古人员开展了对3号陵西碑亭的清理，出土了石雕力士志文支座等文物，首次发现3号陵西碑亭建筑形制存在差异。2000年至2001年，为了对3号陵进行加固保护，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夏陵区管理处对3号陵地面遗迹进行了发掘，历时两年，实际发掘面积约2万平方米。“这次发掘是西夏陵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杨弋回忆道，“我们聘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现场指导，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为研究西夏陵建筑布局和装饰技法提供了丰富材料。”

2007年至2008年，为了对6号陵进行加固保护，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对六号陵地面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整个考古发掘工作共耗时两年，发掘总面积达到了15000平方米。

2013年至今：对陪葬墓、防洪遗址的调查研究

该阶段共有4项考古工作，分别为对陪葬墓、防洪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研究、对3处防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2013-2016年，为了编制《西夏文物》，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对陵区陪葬墓与防洪工程遗址进行了调

查，共统计陪葬墓271座，发现防洪工程遗址32处，其中防洪墙26处，排洪沟6条。该阶段调查发现陪葬墓的数量也由253座增加至271座。

202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夏陵的防洪工程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示了古人

顺地势修建的防洪工程，其中一些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此外，分别对2号陵西侧与Ⅲ区M93陪葬墓局部进行了发掘。对3处防洪墙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极大地丰富了对西夏陵防护设施建造方法与类型的认识。

西夏文灰砂岩残碑



西夏灭亡后，后朝并没有为其修专史，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近代黑水城文献的发现才重新引起学界关注。杜建录作为当代西夏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主持整理了《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等重要文献，为西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指出：“西夏虽然被官修正史忽略，但其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贡献不容忽视。”

历史地位与文化遗产

政治上，西夏“以儒治国”，完成了游牧部落向封建国家的转变；经济上“耕牧传国”，开发了河套地区灌溉农业；科技上，西夏的活字印本是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文化上，西夏壁画中的唐僧取经图比《西游记》早了300年。杜建录总结道：“经过西夏近200年的发展，党项社会全面封建化，经济一体化，思想儒家化，使西北地区和祖国内地成为紧密的整体，为元代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光已经远去，但正如杜建录教授所言：“西夏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夏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更是为了理解中华文明包容并蓄的强大生命力。”

1048年，西夏发生宫廷政变，开国皇帝元昊被太子宁令哥刺杀，权臣没藏讹庞立年仅周岁的谅祚为帝，是为夏毅宗。对此，杜建录分析说，从谅祚开始，西夏进入了长达三代的外戚专权时期，表现为“蕃礼”与“汉礼”之争，实质是皇权与后权的斗争。这种斗争直到崇宗乾顺时期才告一段落，汉文化最终取得优势地位。

1139年，夏仁宗李仁孝即位时，西夏周边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杜建录指出：“当时宋朝已南迁，辽朝灭亡，金、宋形成对峙局面，西夏获得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机遇。仁宗在位期间，西夏经济文化达到鼎盛，但也埋下了衰落的种子。法律保护土地买卖致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激化社会矛盾，为西夏晚期危机埋下伏笔。”

13世纪初，蒙古崛起成为西夏的致命威胁。从1205年到1227年，蒙古先后六次进攻西夏，使其最终灭亡。西夏灭亡后，“部分西夏遗民迁徙至甘孜地区，建立了西昊，这一政权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年间，如果将这段历史计算在内，党项政权实际上存在了近800年。”杜建录说。

这件瓷罐高30厘米，直口短颈丰肩，鼓腹下收。罐子腹部的三处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花纹，并用弧线和花叶衬托，层次分明，手法娴熟，堪称珍品。



白釉剔刻牡丹花罐



扁壶



西夏瓷器多施薄釉，釉面薄润光亮，流动性好，故积釉、淌釉现象普遍。主要釉色有黑釉、白釉、褐釉、浅青釉茶叶末釉、姜黄釉。

多元一体的文明

西夏的政治制度体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杜建录指出：“西夏虽然表面上强调自己特色，但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儒学。”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在重要地区设郡、府。军事上，西夏建立了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组成的武装力量，其中重甲骑兵“铁鹞子”有着强大的战斗力。

在教育文化方面，西夏呈现出“蕃汉并重”的特点。“西夏大兴儒学教育，先后建立蕃学、汉学、小学、太学等教育机构，教材是将儒家经典翻译成西夏文。”杜建录说，1146年，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尊孔为帝的先河。同时，西夏还确立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进一步推动了儒家文化在西夏的传播。

西夏文化的多元性还体现在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上。杜建录教授解释说：“西夏文是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的，它借鉴了汉字的形体和造字方法。”这种文字在西夏境内广泛使用，不仅用于官方文书，还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和佛经。在宗教方面，西夏以佛教为国教，杜建录指出：“西夏用了50余年时间翻译出3579卷西夏文《大藏经》，这在我国乃至世界译经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北宋初年，夏州节度使李继捧入朝献地，引发其族弟李继迁的强烈反对。“李继迁是西夏实际的奠基者，他联络党项豪族起兵抗宋，经过15年斗争，最终，宋朝授其为夏州节度使。”杜建录介绍说，随后，李继迁向西扩张，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经过他和儿子李德明两代人的努力，党项政权逐渐控制了河西走廊。

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南郊筑坛祭天，正式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杜建录强调：“元昊建国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民族特色的措施，如创制西夏文、推行秃发令、改姓嵬名氏等，但其政治制度核心仍是仿照中原王朝。”西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包括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等机构，基本模仿北宋制度。

历史篇

记者 王敏

揭开神秘面纱

西夏（公元1038-1227年），又称大夏国、大白高国等；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鼎盛时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自1038年建立，传十代皇帝，于1227年被蒙古所灭。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是当代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今天就让我们在他的介绍中，了解神秘西夏的迷人故事。

西夏的崛起之路

西夏，公元11-13世纪由党项人建立。党项人作为西夏的主体统治民族，7世纪之前曾活动于中国青海省东南部、四川省西北部的广袤草原和山地间。

杜建录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党项是古羌族的一支，隋唐时期迫于吐蕃压力逐渐内迁，这一迁徙过程持续了数百年，后来在陕北和鄂尔多斯地区逐渐定居下来。”唐朝末年，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因协助朝廷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氏，统辖夏（今陕西横山）、银（今陕西米脂）、绥（今陕西绥德）、宥（今陕西靖边）、静（今陕北一带）五州之地。

北宋初年，夏州节度使李继捧入朝献地，引发其族弟李继迁的强烈反对。“李继迁是西夏实际的奠基者，他联络党项豪族起兵抗宋，经过15年斗争，最终，宋朝授其为夏州节度使。”杜建录介绍说，随后，李继迁向西扩张，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经过他和儿子李德明两代人的努力，党项政权逐渐控制了河西走廊。

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南郊筑坛祭天，正式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杜建录强调：“元昊建国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民族特色的措施，如创制西夏文、推行秃发令、改姓嵬名氏等，但其政治制度核心仍是仿照中原王朝。”西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包括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等机构，基本模仿北宋制度。

